

往事如昨

山村一日

潘云强

1990年秋的一天,一大早,我坐车到了海阳的发城镇王家山后村。我来采访多次获得烟台市县两级优秀共产党员、劳动模范称号的村党支部书记王增云。

当时正是农村最忙的时候。王增云就像一名战时的将军,在办公室、果园、庄稼地之间不停地来回穿梭,现场进行生产调度。见他忙得像个陀螺,我没打搅他,在村里其他干部的协助下,通过座谈会和找重点人物谈话的形式,对他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。

王增云在新中国成立前便参了军,由于他踏实肯干,很快被提拔为干部。在一次执行国防施工任务时,担任连长的他身受重伤,被紧急送往医院。经过手术,医生在他的腰部安上了钢卡子,他这才勉强能站起来走路。当时摆在王增云面前的有两条路,一条是留在部队疗养,另一条是转业到部队所在城市。他既不愿给部队增加负担,又不想在城里过那种悠闲的养老生活,于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海阳王家山后村。

当时农村的生活条件太苦了,为了改变家乡的面貌,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,1973年,被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的王增云,克服身体残疾带来的不便,带领乡亲们战山斗水,开垦梯田,开办了石子场、石灰窑厂等副业。

在很短的时间内村子便有了起色,但他总觉得缺少一个主业,缺少一根可以彻底撬动村民穷根的杠杆,按百姓话说是缺一个“打人的家伙”。石子厂、石灰窑厂这些以耗费资源、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企业,终究不是长久之计。王家山后村共有多大大小小十一座山头,属于典型的丘陵地形,土地富含磷钾等元素,具有光照时间长、昼夜温差大等特点,特别适合苹果生长。思忖了半天,党支部一班人几经讨论,决定栽种苹果。

1984年,他们听说青岛农科所引进了红富士苹果,便去买回了果苗,建了600亩的优良品种育苗基地。一下子育这么多苗,对于当时还不富裕的村集体来说,也算是一步险棋。一旦不成功,不但投资苗圃的钱打了水漂,还会损伤大家刚刚冒出来的积极性。既然想干事业就要承担一定风险,在育苗的日日夜夜里,王增云吃不下饭、睡不好觉,一头扑到苗圃里。有的群众说,他当时的状态像极了一只要生蛋的鸡。

树苗出圃后,王增云果断地把村里1500亩山岚全部种上了红富士苹果,从此,村旁出现了一条长达3公里的苹果谷。

由于他们培育的是优良的红富士矮化品种,一亩地能栽种二百余棵,比原来多栽一百多棵。挂果也仅需三年,六七年便可进入盛果期。依靠苹果的收入,村子慢慢地有了积累,村民们的收入也显著增加了,从此苹果成为村里的摇钱树。1990年,全村共生产苹果750吨,收入170万元,这个数字,现在看来微不足道,可在当年却是个了不起的成绩。在原农业部举办的栽种红富士苹果十周年总结验收大会上,王家山后村注册的“皇家”牌红富士苹果以个大、形佳、味美被评为第一名。他们的苹果不愁卖,虽然价格比别的地方的苹果要贵,但每到苹果收获季节,村子就门庭若市,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蜂拥而至,王家山后村也因此获得“红富士第一村”的美誉。

当晚,王增云邀我去他家,我才与他见面。那年,他刚好60岁,个头矮矮的,头发灰白,脸上的皱纹很深,从外表看不像是个享受离休待遇的老干部,倒像个地地道道的农民,但他干脆利落的话音、坚毅的目光,又透露出他是个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倔强老头儿。

晚饭是王增云的老伴用大灶做的,纯粹的农家饭。吃饭时他也不得闲,来的人络绎不绝,像是赶集。有打听第二天摘苹果事宜的,有打听化肥价格的,也有询问村里何时请技术员讲解果树剪枝及病虫害防治的,其中有一位老人,待了半个小时,啰啰嗦嗦讲了不少,似乎是谈两家果园因边界划分不清引起了纠纷。王增云耐心地跟他解释了好长时间,我在一旁饶有兴趣地听着看着这一切。

窗外夜已深,皎洁的月光轻柔地洒向山川大地,悠长旖旎的苹果谷也显得神秘莫测,整个山村仿佛进入了深度睡眠。偶尔有风吃过,可以听见苹果树叶沙沙响动。屋子里,王增云谈兴未减。他说农村的事杂乱,千头万绪,但关键要贯彻执行好党和国家的各项政策,在政策指引下,制订出适合本村特点的发展规划来。胶东老百姓有一句“上什么山唱什么歌”的俗语,强调的是不墨守成规、死搬硬套,要从实际出发。王家山后村栽种苹果,就是结合山多水好的资源,为乡亲们寻找的一条致富路。他的话蕴含哲理,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。

王增云还谈到了村子未来的打算,如对村民房屋统一进行建设,筹建村里的苹果博物馆,办好村里的托儿所、养老院、学校,以及让村民享受更好的福利待遇等。在那个静谧的山村秋夜,他侃侃而谈,说到动情处,这个花甲老人竟手舞足蹈,兴奋得像个孩子。

如今,三十多年过去了,我仍然难忘那山村的一日,乡村建设正因为有了王增云这样的人,才变得越来越美。

推炭

康勤修

天气一冷,暖气就来了。坐在温暖如春的暖气房里,我不由得想起上世纪70年代初期,为冬日取暖,父辈去外地推炭的往事。

推炭就是用一辆木制手推车推着两只长方形的棉槐筐去买煤,然后再推回家作为家人冬季烧火做饭或取暖用的燃料。推炭在那时是一项十分繁重的体力劳动。

煤炭在我们老家鲁西南一带,人们称之为“炭”。以前一到秋冬农闲季节,家里的青壮年劳力就结伴到离家五六十公里以外的山后去推炭,准备过冬。那个时候在农村,解决冬季取暖、烧火做饭问题,可是一个家庭的大事。

过去用手推车推炭,一车最多能推一二百公斤,一般四五口人的家庭,如果省着点烧,一车炭能烧个把月。在我儿时的记忆中,每次去推炭,父亲都是提前向邻居家借来两辆木推车,然后请我二姑父和他一起结伴去山后。

早晨鸡叫三遍的时候,我母亲就起来,到厨房生火做饭。母亲将一块白菜头切细,再切好葱姜末,爆锅,烧一锅热气腾腾的疙瘩汤,泡上几个干煎饼,让父亲就着咸菜喝碗疙瘩汤。吃饱喝足后,父亲揣上块儿八毛的炭钱,带上一包煎饼和咸菜疙瘩,推车出发。每次去山后推炭,路过国营饭店,父亲和二姑父都是花二分钱买两碗白开水,啃着咸菜疙瘩,就着煎饼凑合着填饱肚子。至于国营饭店里一毛四分钱一碗的大烩菜,两人只能隔着窗口闻一闻香味,舍不得花钱买。

那时候,在我们老家那一带,大小煤矿不少。记忆中,离家较近的煤矿有孙村煤矿、小协煤矿和岐山煤矿,大都有五十多公里远的样子。岐山煤矿算是离家最近的,只是岐山煤不耐烧,父亲他们宁可走远一点,到孙村煤矿或小协煤矿去推炭。

从周边乡村来推炭的人特别多,每天都要排很长的队。听父亲说,那时候推一车炭的费用并不贵,需要八毛或一块多钱的样子,但是人工是需要自己付出的。那时生活在农村的人们,虽然兜里钱少,但最不缺的就是力气。

推一车炭,来回要用两天多的时间。父亲他们要走五十多公里的路,而且那时的路高洼不平、上坡下坡的,十分费力气。每次父亲推炭回来,都是灰头土脸的,一身疲惫的样子。看着父亲为生活所付出的艰辛和汗水,我就暗暗发誓,等我长大了,一定替父亲去推炭,让父亲好好歇息一下。

虽然父亲起早贪黑、辛苦遭罪去推炭的事情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,但仍然深深印在了我的记忆里。如今的冬天,有暖气有空调,人们再也不用为燃煤犯愁了。我庆幸自己赶上了好时代。

乡村记忆

芋头情

叶展韵

农谚云:霜降见霜,米谷满仓。霜降之际,不仅米谷丰收,芋头也丰收。每年的霜降时节,地里一排排的绿叶下,是一堆堆成熟的芋头,它们就像旧时钟鸣鼎食人家围坐一起的样子,等待着人们把它们挖出来。出土的时候,也就有了破茧成蝶的意思。

收获芋头的时候,乡人都是用三叉镢,猛地一用力,一镢下去,尽可能地把这一墩芋头刨出来,不至于让它们“妻离子散”。芋头刨出后,先把硕大的绿叶掰掉,再把芋头上的毛须摘掉,放在地里晒太阳,这样芋头就会面一些。

芋头的吃法很多,可以烀着吃,可以剥皮切片焖着吃,也可以剥皮切片加入豇豆汤、面条汤中煮着吃,使得豇豆汤、面条汤润滑。

每年“五一”前后,家家户户都忙着种芋头。夏天是芋头猛长的时期,远远望去,一片片绿油油的芋头叶如一片绿色的海洋,在微风中,硕大的叶子摇曳,宛如绿衣舞女翩翩起舞,风姿绰约,妩媚动人。

记得中学毕业那年的夏天,我跟着父母去田里锄地。烈日炎炎,口干舌燥,我跑到远处山涧的泉眼喝水。父母为了多锄一垄地,不舍得耗费时间跑远路去喝水。我喝足了甘甜的山泉水,正愁如何捎点水给父母喝。猛一抬头,看到田地里一片片苍翠欲滴的芋头叶,我赶忙跑到地里,挑选了最大的一片叶子围成圆形,盛满水捎给父母。

上世纪70年代中期,物资比较匮乏,年少的我觉得最幸福的时候就是中秋节和春节。中秋节可以吃上新鲜的芋头。印象中,每年中秋节的那一天,母亲总会去地里刨两三墩芋头(不舍得多刨),把皮剥掉,洗净,切成片,往锅里倒入花生油烧开,加葱姜末炒香,然后加入芋头片,爆炒,加一点点盐和适量的水。在锅里的水即将没有时加香菜碎,翻炒几下,出锅。香菜的香味在那一刹那爆发出来了,并引出了芋头的香味。香菜的香味融入芋头里,芋头掩映着香菜的香味,真是“香似龙涎仍酽白,味如牛乳更全清”。圆圆的月儿下,饭桌上不仅有月饼、水饺,还有热气腾腾、香味扑鼻的芋头。这时我会想到:天上的龙肉,地上的驴肉,中秋的焖芋头。除夕之夜,饭桌上必定会有一盘烀熟的芋头,因为芋头还有更美好的寓意,预示着年年有余。人们把心中美好的希望和对幸福生活的殷切期盼,都寄托在芋头上,融化在心里。

在乡村,纯朴的乡人都有分享丰收成果的习俗。如果谁家没有种芋头,秋收后,街坊邻居会挑选个大的芋头,装满篮子送过去。他们还会把芋头一袋一袋装满,送给在城里或外地的亲戚朋友。虽然送去的是芋头,但却是一份情谊、一份牵挂、一份温暖。

作家许地山在《落花生》一文中说:“人要做有用的人,不要做只讲体面而对别人没有好处的人。”我想,这一句话用在芋头上同样适用,芋头恰恰也做到了“不讲体面而对别人有好处”这一点。